

非洲当代领袖

FEIZHOU DANGDAI LINGXIU

〔南非〕A.P.J.范伦斯伯格

秦晓鹰 殷罡 译

重庆出版社



愿和卓有成效地为我翻译了许多非洲领导人的原始材料。比勒托利亚HAUM出版社的H·普林斯露小姐则做了大量的打字工作。最后要提的，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我的妻子。……她对本书最终会取得成功的信心从未动摇过。

必须指出，这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是在1974年8月底前写的，这就是书中还包括了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原因，而从那以后他便被废黜，由他的儿子取而代之（原文如此——译者）。而且我要强调，在某些篇章里，特别是那些不太为人所知的国家和领导人的篇章里，我有意把这些领导人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历史、地理和经济环境的背景之中。

各个章节的篇幅，是由这些领导人所提供事实的质量，和他们在当代非洲和世界事务中所起作用的重要性决定的。

最后要说的是，如果本书能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认识——世界必须向非洲学习许多东西，我便大喜过望了。东西方普遍而十分正确地认为，非洲必须向他们学习，但这种倾向妨碍了向非洲学习的趋势。我们完全有把握地说，非洲和世界其它地区日益增加的接触，发展了外交技巧。人类的交流在非洲遇到了新的挑战和新内容。当代领导人的政策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A·P·J·范伦斯伯格

1974年9月于比勒托利亚

A · P · J Van Rensburg
Contemporary Leaders of Africa
根据HAUM出版社1975年英文版译出

非洲当代领袖 秦晓鹰 殷 罡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达 县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5.125 插页2 字数361千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100

书号: 11114·64

定价: 2.13元

出 版 说 明

南非历史学家范伦斯伯格写的《非洲当代领袖》是一本以资料性见长的著作。作者撰写的45位非洲国家元首(本书选译了其中32位)的传记,不但包括了他们各自的身世、走上政界的经历、奉行的国内外政策和主要政绩,而且较详细地介绍了非洲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军事和边界等情况。同时也介绍了这些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据原作者说,该书的大部分传记和社会背景材料都是由这些领导人亲自提供的。书中涉及的几十位人物虽然有的已经做古,有的已从政界销声匿迹,但由于他们曾在各该国历史中起过显著作用,加之原书编写上的特点,使它仍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非洲发展的线索。

作者在书中虽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但基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分析是十分错误的。诸如独立后非洲国家与原宗主国的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在非洲的历史地位、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发展道路、非洲人民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与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斗争的关系、中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等等。作者还在书中多次为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辩护。我们相信,读者对这些问题会有所警觉和批判的。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书中一些错误的统计数字做了订正和注释,对内容做了少量的删节。

原书作者简介

A·P·J(阿雷)·范伦斯伯格, 1929年生于林德莱, 在奥兰治自由邦迷人的乡间长大成人, 是一个农夫的儿子。他在奥兰治自由邦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 并在1963年获该校历史学博士学位。随后, 他在南非的许多大学里讲课, 包括奥兰治自由邦大学和西角大学。1969年起, 他又任教于比勒陀利亚大学, 并开始专门研究非洲历史。他是首先用南非公用语写成非洲史的作者, 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章和评论。

范伦斯伯格是南非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和南非历史学会的成员, 并担任南非历史学会的编辑。他已婚, 有3个儿子。

前 言

非洲是世界的一部分。对于非洲，我们不能再一无所知了。在殖民帝国的灰烬之中，这块“最古老”的大陆诞生了许多“最年轻”的国家。而且，非洲已不再是大国的竞技场，或东西方进行试验和“寻求答案”的试验室了。1974年的非洲人确实有助于谱写人类历史的戏剧，并进行了许多大胆的试验。然而，人们很少对那些为非洲辩护和决定非洲命运的领袖有所了解。正是这些领袖们的生活和他们推行的政策，表现了非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同时，他们的生活又充满了非常引人入胜的故事：通往权力的道路，成功和失败和在新的国家环境中对声望的不断追求。

过去，非洲一直被错误和无知地诬之为“黑暗的大陆”，而我却把它称为“明天的大陆”。甚至它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压力和问题复杂性都不能改变这一前景。在独立之后，仅仅十多年的时间里，这块大陆许多地方的非洲人已经缩短了不发达和工业化之间的差距，缩短了自然经济和参与世界出口贸易的差距，以及仅仅作为学术讨论的对象和参与决定整个人类命运的积极对话之间的差距。

今天，在一度不断受到“保护”，使之不能向西方所说的“文明”迈进的非洲殖民地地区里，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在帮助提供原子时代所需的铀。作者遇到过许多有教养的非洲医生、学者、商人和政治家。这些人的父母在几十年前还生活在远离世界历史主流

的孤单的小村庄里。而今天，我们却看到非洲人在联合国会议上和世界银行关于货币问题讨论会上取得了发言权。他们甚至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今天，越来越多的当代非洲政治家、政府官员、学生和商人访问了欧洲、美洲、苏联和远东。在这些国家里，他们与同行交谈，向各式各样的听众和观众发表讲话，无论是在全国性的电视采访中还是在教堂的晚餐会上。

在短暂的时间里，非洲就发生了这些令人惊奇的变化。这些变化为接纳进步和稳定的非洲国家进入世界大家庭铺平了道路。在这场戏剧性的冒险中，当代非洲领导人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有鉴于此，本书做了这样的尝试：把非洲大陆的领导人集中在一起，以便使世界了解他们的理想、抱负以及他们为获得某些成果所做出的可贵的尝试。这些成果将与我们的时代共存。我们所热爱的非洲大陆，将变成人类的圣殿，因为历史和地理条件已使这一前景成为可能。

本书中的大部分传记和背景材料都是由有关领导人亲自提供的。他们出色地满足了我寻找可靠材料的要求。他们对本书的撰写所表现的兴趣是令人鼓舞的，并毫无保留地向我提供了他们各自国家的历史材料。在这方面，我特别要向以下几位领导人表示感谢。这些领导人是：肯雅塔总统、雅库布·戈翁总统、塞古·杜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总统、利奥波尔德·桑戈尔总统、奥马尔·邦戈总统、哈杜卜·布尔吉巴总统和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总统、莱布阿·乔纳森首相、海尔·塞拉西皇帝和哈桑二世国王。倘若没有他们的帮助和鼓励，我很怀疑这本书的内容会象现在这样丰富。

我还要提到南非外交部的巴布先生。他对这本书自始至终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和同一部门的珍妮特·威廉斯小姐一起，自

目 录

前 言	1
胡阿里·布迈丁（阿尔及利亚）	
——一个为第三世界说话的非洲人	1
塞雷茨·卡马（博茨瓦纳）	
——在动荡的南部非洲保持清醒的头脑	20
阿赫马杜·阿希乔（喀麦隆）	
——从邮局职员到总统	30
让·贝德尔·博卡萨（中非共和国）	
——非洲战士	42
马里安·恩古瓦比（刚 果）	
——非洲唯一鼓吹“无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人	59
马蒂厄·克雷库（达荷美）	
——他使青年军人做了政治生活的主宰	68
安瓦尔·萨达特（埃 及）	
——一位领导着阿拉伯世界的非洲人	77
海尔·塞拉西皇帝（埃塞俄比亚）	
——非洲最后一个封建主	94
奥马尔·邦戈（加 蓬）	
——非洲一个新兴国家中的全面人才	112

达乌达·贾瓦拉(冈比亚)	
——一位领导着非洲最小国家的兽医	125
塞古·杜尔(几内亚)	
——他对戴高乐说:不	132
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象牙海岸)	
——非洲最老练的领导人	151
乔莫·肯雅塔(肯尼亚)	
——动荡非洲的一尊磐石	168
穆阿迈尔·卡扎菲(利比亚)	
——一位不寻常的非洲穆斯林	192
穆萨·特拉奥雷(马里)	
——往日“好同志”今天领导人	206
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毛里塔尼亚)	
——一位不求浮华的非洲国家元首	213
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毛里求斯)	
——领导着一个非洲国家的印度人	219
哈桑二世(摩洛哥)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维持平衡	228
赛义尼·孔切(尼日尔)	
——“秩序和权威是最根本的需要”	241
伊恩·史密斯(罗得西亚)	
——公然同大多数国家进行了10年的对抗	250
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卢旺达)	
——宣传不分种族差别的仁爱	269
列奥波尔德·桑戈尔(塞内加尔)	
——非洲最有学问的国家首脑	276
西亚卡·史蒂文斯(塞拉利昂)	

——从火车站长到总统	301
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索马里)	
——从牧羊人到索马里总统	315
伊迪·阿明·达达(乌干达)	
——非洲的推土机	326
加法尔·尼迈里(苏丹)	
——黑非洲和阿拉伯非洲的统一	346
索布扎二世(斯威士兰)	
——非洲的传统主义者	369
朱利叶斯·尼雷尔(坦桑尼亚)	
——他使非洲接受了一种土生土长的政治学说	372
哈比卜·布尔吉巴(突尼斯)	
——不知疲倦地为自由和尊严而战	397
艾蒂安·埃亚德马(多哥)	
——一个不愿无功受禄的人	414
蒙博托·塞塞·塞科(扎伊尔)	
——马基雅维里和俾斯麦在非洲的化身	426
肯尼思·卡翁达(赞比亚)	
——力求成为非洲崛起的象征	449
后 记	472

胡阿里·布迈丁

（阿尔及利亚）



——一个为第三世界说话的非洲人

阿尔及利亚是非洲第二大国，总面积为2,381,743平方公里，位于摩洛哥和突尼斯之间。它有岛屿的意思。这个名字是从海岸岩石岛引申出来的，也含有进港船只有危险的意思。

阿尔及利亚东部与突尼斯和利比亚接壤；南部与马里、毛里塔尼亚毗邻；西部为西属撒哈拉和摩洛哥。阿特拉斯的两条山脉由东至西横跨该国北部，这一走向与海岸线大致平行，并且将北部的沃土地带与撒哈拉沙漠截开。全国约85%的土地为贫瘠的沙漠。

这片高原上放牧着众多山羊和绵羊。当一些小的湖泊在干旱季节变得干涸时，高原还能提供食盐。南方还有一些肥美的绿洲，它们因出产椰枣而素有盛名。

阿尔及利亚的人口增长率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一个世纪中，它的人口已翻了四倍。很多专家估计这种增长率还将持续下去。目前，40%以上的人是在15岁以下。

阿尔及利亚在最近50年中，一直被认为是最贫困的国家。它的经济飞速发展起始于大规模的原油生产。1972年这项生产已超过5,500万吨。然而，阿尔及利亚真正的财富还是来自天然气，它拥有世界天然气总储量的10%。这使阿尔及利亚成为世界注目的国家，使它一下子进入了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

一个非洲农村青年

当布迈丁还是一个学生时，他的父母就切望他能够受到法国式高等教育。因为当时阿尔及利亚还处在法国统治之下，能达到那一步就是将来有出息的奠基石。可是由于家境贫寒，这个天资聪慧的孩子只能在一家清真寺学校里读书。在那里结业后，他既没有到索邦，也没有去爱资哈尔，而是来到一所开罗的古老著名的伊斯兰教会大学就读。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当他在1974年4月11日登上联大特别会议讲台，就原料和发展问题发表重要演讲时，他才能用一口爽利的阿拉伯语发言。在那次发言中，布迈丁主席号召不发达国家要从外国垄断势力手里夺回对本国资源的控制权。他宣称这些国家要一直“坚持到成为自己家园的主人”。他表达了那些贫穷国家对富裕国家长期不满的情绪，希望不发达国家结成更广泛的联盟，在一场为了生存的斗争中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抗。他向那些比较贫穷的国家鼓吹这种观念，要他们也象阿尔及利亚一样，致力于本国经济的发展。他同时批判了富国的“极度挥霍和‘奇技淫巧’”以及“肆无忌惮的浪费”，对在武器生产、军事侵略和太空计划中的巨大耗资感到痛惜。最后，他呼吁通过一项由大会确认的对最不发达国家进行援助的计划。

在布迈丁主席的敦促下，世界原料生产形势的特别会议，对于确定发展中国家原料生产的合理价格尤为关注。此后，当他与尼克松总统同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他在那里也起到了第三世界发言人所起的应有作用。

布迈丁主席对于他的作用是十分清楚的。在那次一个多小时的演说后，当有人问他是否觉得疲倦时，他十分得体地回答说：“我怎么会感到倦怠呢？我所说的都是所有第三世界关心的问题。”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

信念和决心对腼腆、单薄的布迈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他生平的一些事情常常被人说得含糊不清，看法也有分歧。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格勒马地区靠克劳泽尔的某个村子里。他出生的时间是1925年8月23日。他是布哈鲁巴生的7个孩子中的一个。他的双亲都是贫困的农民。他们用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给他命名，其他的名字是本·布拉海姆。若干年后，在反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起义中他又用父母的名字作为化名。

他是在格勒马的科兰接受小学和宗教教育的。之后，便前往君士坦丁堡省的凯塔尼·麦德萨，主要学习阿拉伯宗教课程。后来，他到艾资哈尔大学学习，并由于多种原因，他得以逃避去法国军队服兵役。

在开罗，这位年轻人在他学习古典阿拉伯教的同时，也逐渐磨砺出自己的政治信念。在50年代初期，法鲁克国王被推翻，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崛起。这段时期，布迈丁参加了一个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中也有阿哈迈德·

本·贝拉。本·贝拉已经筹划着一场反对法国人的革命。毕业后，布迈丁作为一名教师返回了格勒尔。

当1954年阿尔及利亚起义爆发时，他正在格勒尔。于是，他立即前往埃及的希尔温接受军事训练；之后，又去摩洛哥学习游击战术，并作为奥兰地区一个游击小组的负责人，被阿哈迈德·本·贝拉吸收到民族解放阵线。

布迈丁在民族解放军中升迁迅速。1957年，他任第五军区司令，成为民族解放阵线的6名司令员之一。1958年6月，他成为包括阿一摩(摩洛哥)边界一线的西部军区民族解放军的司令。1958年9月，他成为阿尔及利亚革命国民会议的成员。以后，他晋升为上校(这是当时最高军阶)，并且担任阿尔及利亚总参谋部的参谋长。他提出了一套颇为卓越的军事战略，显示了他的军事领袖才能。他几乎是一位斯巴达式的律己极严的军人，因此深受下属们的尊敬。从那个时候起，这些人便对他忠实不渝。然而，布迈丁却不喜欢与那些参加起义的文职领导人接近，因为他把这些人看成是“资产阶级”。

主 席

反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革命结束后，“资产阶级”流亡政府掌握了政权。在自称“老近卫军”本·赫达和青年民族主义者的象征本·贝拉的权力斗争中，他由于对本·贝拉的支持，于1962年6月被免去军队职务。他在撒哈拉找到一处临时避难处，并在本·贝拉手下指挥一支军队。1962年9月，本·贝拉在竞选总理中获得90%的选票而取得胜利，他因而得以重返政界。

1962年阿尔及利亚取得独立。同年，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当时，这位未来的主席还是一个粗犷、不谙世故的人物。他这时首先

关心的是如何加强军队。为了得到苏联的军事装备，他前往莫斯科。布迈丁提高了战士的军饷，办了一份双周报纸《军队》，反映他们的呼声，建立了为军人服务的合作社，这使他很快就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支5万人的嫡系队伍。

1963年之后，他与本·贝拉的关系恶化了。本·贝拉的行为证明他自己是一个最坏的独裁者，他企图大权独揽。1965年，他已经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军队仍然热烈地忠实于布迈丁。本·贝拉便开始一步一步地打击他这个从前的战友。首先，他任命塔哈尔·兹比利为总参谋长。可是，布迈丁通过与兹比利达成的一项秘密约定，继续控制着军队。接着，本·贝拉又迫使支持布迈丁的内务部长麦迪哈里辞职，并且试图迫使布迈丁的另一个支持者、外交部长布特富利卡辞职也几乎奏效。1965年之前，几乎所有其他“元勋”都从政治生活中被排除掉了。

1965年初，本·贝拉曾计划在万隆会议十周年纪念之际，召开一次亚非会议，其目的是要使人们承认，他既是阿尔及利亚无可非议的领袖，又是在亚非事务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次会议原计划于6月29日召开，然而，就在会议即将召开的前10天，本·贝拉就在一场突如其来的、不流血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了，并遭到逮捕。这次先发制人的政变，成功地粉碎了本·贝拉个人的一项计划：他准备在亚非会议召开的同时进行一次政治大清洗。如果这次清洗出现，将会导致“左”的倾向，那么，布迈丁和很多右翼部长就将遭到拘捕。然而，兹比利和布特富利卡事先把这项清除布迈丁的计划告诉了他。于是，布迈丁立即动员支持他的军队，在10名精选的军官和1,000名军人的协助下，夺取了政权。

在一份公报中，布迈丁宣称他所指挥的这场政变是要结束

本·贝拉的“个人统治”，“冒险主义”以及“对权力的丑恶的追求”。他把这个从前的战友称为“凶暴的独裁者”。

当布迈丁取代本·贝拉时，很多局外人对布迈丁的情况还是一个未知数。可是，一旦有报道说，那里既未发生灾难也没有出现仇杀时，他便得到了来自埃及总统纳赛尔极为重要的支持。当时，纳赛尔是阿拉伯世界中最强有力的人物。尽管中国很快就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新政权，但使之左倾的设想却一直没有能实现。

阿尔及利亚最高政治当局是由“革命委员会”担任的。它主要由以布迈丁上校为主席的一批军界人士所组成。1965年7月初，一个由20名成员（其中9人原是本·贝拉政府的官员）组成的政府宣告成立。布迈丁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并担任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他还保持着战争时期的习惯，常常工作到深夜。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公众的代言人。公众们感到，他的政府是一个认真考虑把阿尔及利亚拖出贫困的政府。这种贫困曾在这位主席的早年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布迈丁依然生活得很简朴，虽然去年他与一位阿尔及利亚女法官结了婚，但这位老游击队员仍保持着一种单独活动的癖好。甚至在国外的阿尔及利亚官员们都说，他们不知道这位夫人的名字。

社会和经济的复苏

布迈丁主席对繁文褥节和抛头露面有着一种近似清教徒式的反感。他对记者招待会或记者的访问感到厌恶。他的嗜好很简单，也没有高速汽车、私人飞机和自备游泳池。他投身于为阿尔及利亚发展的工作中，也花一点时间关注国际问题（当然，这不包括阿以冲突和第三世界的贫困这一“为人遗忘的现实”）。1971年他曾经

说：“你不能只用好话来供养人民。他们需要的是面包、鞋子和学校。”

1965年11月1日，布迈丁主席在对全国的一次讲演中指出：他的政府注重谋求一个“建立在社会正义和尊重民族价值上的社会主义。”他说，他的政府将通过纪律达到民族团结，通过一系列计划做到生产增长，通过苦行和自我牺牲而变得强大。他希望克服他的前任遗留下来的很多缺陷，创造一种以稳固的经济为基础的“牢固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革命委员会首先整顿了本·贝拉时期破败不堪的经济。对私人经营的农业生产的分配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制定了大规模农业改革计划，将对私人占有的土地加以重新分配。一项长期规划也已经批准，它的目的是要使某些传统的形式得以现代化，其中包括土壤的利用和畜牧业的改造以及有步骤地搞好水土保持。

布迈丁重视国家发展重工业特别是石油化工业和钢铁工业，鼓励本地的加工制造业，促使把国内的原材料生产转变为供国内消费的工业产品的生产。他还赞成利用外国资本，并表示在“我们确定的基本条件的范围内”欢迎外国投资。

另一个重点是考虑在行政和政治方面加强纪律和计划性。1966年颁布了一项行政机构法，借此使一个受到损害的制度健全合理起来，同时创造一个秩序井然的局面。缩减了外交顾问的人数，在计划管理方面，逐步转为完全阿尔及利亚化，并按照政府的权力下放计划，在可能的地方授权给地方委员会和公社。各种志愿战士的组织（曾经成为本·贝拉执政时的祸害），被重新组建为自我管理的合作组织，以便约束他们。不过，布迈丁政府在适应某种不可避免的现实时，也显示了某些灵活性。例如：他曾经竭力反对前游击队指挥官的狭隘私利。这些人在独立后的阿尔及